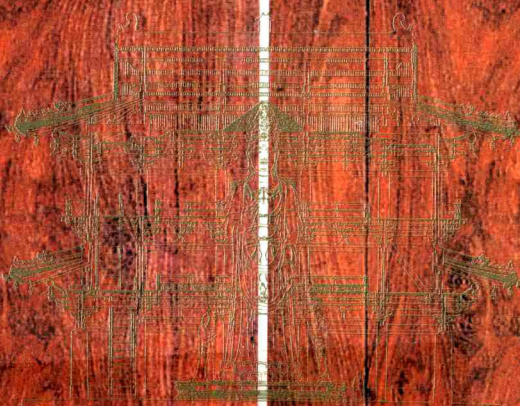


The Record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中国古建筑调查报告

(上)

梁思成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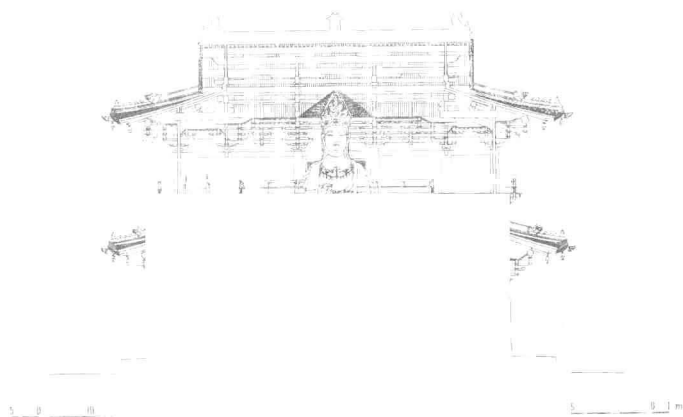


The Record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中国古建筑调查报告

(上)

梁思成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建筑调查报告 (上下) / 梁思成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8

ISBN 978-7-108-03463-2

I. ①中… II. ①梁… III. ①古建筑—调查报告—中国
IV. ①K928.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9985 号

本书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

责任编辑 张志军

封面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刷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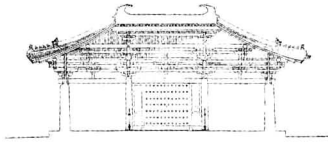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16 印张 56.75

字 数 694 千字 图 1014 幅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160.00 元 (上、下)



中国古建筑调查报告

| 上册 |

总序

楼庆西

梁思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与建筑教育家，他以毕生精力投入到古代建筑的研究工作之中，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他是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梁思成应用世界各国调查研究古代建筑先进之方法，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了长时间的、科学的调查，他和他的同事们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对全国近两百个县城的两千余个古建筑项目进行了考察，写出了一篇又一篇详尽的研究报告，积累了大量翔实的文字与图片资料。梁思成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这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论述我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专著，并同时完成了专为国外读者阅读的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1946年梁思成应邀去美国讲学，他带着《中国建筑史》和他在东北大学讲授“中国雕塑史”的讲稿，第一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博得了国际学术界的敬佩与赞扬。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又继续对中国宋代朝廷颁布的《营造法式》进行研究及注释工作，于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完成了《营造法式》主要部分的注释工作。2001年梁思成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了《梁思成全集》，这是梁先生为人类留下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现在，北京三联书店从梁先生的著作中选择了《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营造法式注释》和《中国古建筑调查报告》又一



次重新出版，这多部著作可以说是梁先生在上世纪的三十、四十、六十年代三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学术成果。历年的古建筑调查报告不但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更为我们显示了梁先生一生所崇尚的严谨学风与精品意识。

梁思成先生一直认为建筑文化应该是大众文化，他本人在后期也写过不少普及建筑文化的文章。三联书店拥有一大批知识分子的读者群体，这次出版梁先生的著作不但是对中国文化和一位著名学者的尊重，而且对普及与提高大众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产生积极的作用。

目 录

上 册

- 总序 楼庆西 1
- 藁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1
- 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 86
- 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 143
- 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 204
- 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 401

下 册

- 写在《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迦木塔》调研报告之前 450
- 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迦木塔 453
- 赵县大石桥即安济桥——附小石桥、济美桥 667
- 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 696
- 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 793
- 广西容县真武阁的“杠杆结构” 871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1]

绪言

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型美术言，尤须重“见”。读跋千篇，不如得原画一瞥，义固至显。秉斯旨以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径。

我国古代建筑，征之文献，所见颇多，《周礼·考工》，《阿房宫赋》，《两都》，《两京》，以至《洛阳伽蓝记》等等，固记载详尽，然吾侪所得，则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辞藻，调谐之音节耳。明清学者，虽有较专门之著述，如萧氏《元故宫遗录》，及类书中宫室建置之辑录，然亦不过无数殿宇名称，修广尺寸，及“东西南北”等字，以标示其位置，盖皆“闻”之属也。读者虽读破万卷，于建筑物之真正印象，绝不能有所得，犹熟诵《史记》“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遇刘邦于途，而不之识也。

造型美术之研究，尤重斯旨，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

我国建筑，向以木料为主要材料。其法以木为构架，辅以墙壁，如人身之有骨节，而附皮肉。其全部结构，遂成一种有机的结合。然木之为物，易朽易焚，于建筑材料中，归于“非永久材料”之列，较之铁石，其寿殊短；用为构架，一旦焚朽，则全部建筑，将一无所存，此古木建筑之所以罕而贵也。然

[1] 本文原载 1932 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莫宗江注



若环境适宜，保护得法，则千余年寿命，固未尝为不可能。去岁西北科学考察团自新疆归来，得汉代木简无数，率皆两千年物，墨迹斑斓，纹质如新。固因沙漠干燥，得以保存至今；然亦足以证明木寿之长也。

至于木建筑遗例，最古者当推日本奈良法隆寺飞鸟期诸堂塔，盖建于我隋代，距今已一千三百载^[1]。然日本气候湿润，并非特宜于木建筑之保存，其所以保存至今日者，实因日本内战较少，即使有之，其破坏亦不甚烈，且其历来当道，对于古物尤知爱护，故保存亦较多。至于我国，历朝更迭，变乱频仍，项羽入关而“咸阳宫室火三月不灭”，两千年来革命元勋，莫不效法项王，以逞威风，破坏殊甚。在此种情形之下，古建筑之得幸免者，能有几何？故近来中外学者所发现诸遗物中，其最古者寿亦不过八百九十余岁^[2]，未尽木寿之长也。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皆辽圣宗统和二年重建，去今（民国二十一年）已九百四十八年，盖我国木建筑中已发现之最古者。以时代论，则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上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

翻阅方志，常见辽宋金元建造之记载；适又传闻阁之存在，且偶得见其照片，一望而知其为宋元以前物。平蓟间长途汽车每日通行，交通尚称便利。二十年秋，遂有赴蓟计划。行装甫竣，津变爆发，遂作罢。至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始克成行。实地研究，登檐攀顶，逐部测量，速写摄影，以记各部特征。

归来整理，为寺史之考证，结构之分析及制度之鉴别。后二者之研究方法，在现状图之绘制；与唐、宋（《营造法式》），明、清（《工程做法则例》）制度之比较；及原状图之臆造（至于所用名辞，因清名之不合用，故概用宋名，而将清名附注其下）。计得五章，首为总论，将寺阁主要特征，先提纲领。次为

[1] 此是30年代日本学界的说法。近年日本学界已公认法隆寺虽为公元607年圣德太子创建，但在公元670年焚毁。公元680年以后在原址西北重建，约在公元710年建成，即现存的法隆寺西院中门、塔、堂、回廊等建筑。但再建的法隆寺西院仍保持飞鸟时代的风格特点，也仍是现存世界上最古的木构建筑。——傅熹年注

[2] 山西大同华严寺教藏，建于辽兴宗重熙七年（公元1038年）（作者注）。当时中国营造学社刚开始进行调查古建筑，尚未积累足够的史料，故多参考日本学者的调查资料，如日本常盘大定、关野贞等的著作《支那佛教史迹》等，薄伽教藏是其中有确切纪年之例，故引用之。以后随着营造学社工作的开展，发现了一些更古老的建筑，最后形成一个有纪年的木建筑的排序目录。薄伽教藏现在的年代排序是第15名。——傅熹年注

寺史及现状。最后将观音阁山门作结构及制度之分析。

除观音阁、山门外，更得观音寺辽塔一座，附刊于后。

此次旅行，蒙清华大学工程学系教授施嘉炆^[1]先生惠借仪器多种，蓟县王子明先生及蓟县乡村师范学校校长刘博泉，教员王慕如，梁伯融，工会杨雅园诸先生多方赞助，与以种种便利。而社员邵力工，舍弟梁思达同行，不惟沿途受尽艰苦，且攀梁登顶，不辞危险，尤为难能。归来研究，得内子林徽因在考证及分析上，不辞劳，不惮烦，予以协作；又蒙清华大学工程教授蔡方荫^[2]先生在比较计算上予以指示，始得此结果。而此次调查旅行之可能，厥为社长朱先生^[3]之鼓励及指导是赖，微先生之力不及此，尤思成所至感者也。

一 总论

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在我国已发现之古木建筑中，固称最古，且其在建筑史上之地位，尤为重要。统和二年为宋太宗之雍熙元年，北宋建国之第二十四年耳。上距唐亡仅七十七年，唐代文艺之遗风，尚未全靡；而下距《营造法式》之刊行尚有一百十六年。《营造法式》实宋代建筑制度完整之记载，而又得幸存至今日者。观音阁，山门，其年代及形制，皆适处唐宋二式之中，实为唐宋间建筑形制蜕变之关键，至为重要。谓为唐宋间式之过渡式样可也。

独乐寺伽蓝之布置，今已无考。隋唐之制，率皆寺分数院，周绕回廊。^[4]今观音阁山门之间，已无直接联络部分；阁前配殿，亦非原物，后部殿宇，更

[1] 施嘉炆，1902年出生，早年赴美留学，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土木系任教，是清华大学土木系第一任系主任，40年代任清华工学院院长，现为清华水利系一级教授，已退休。曾长期任水利学会、水利工程学会理事长。——傅熹年注

[2] 蔡方荫，详本卷《故宫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一文（第285页）。——傅熹年注

[3] 朱启铃（1872—1964），字桂辛，贵州紫江人，历任清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辛亥革命后历任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退休后，于1929年发起组织中国营造学社，1930年正式成立，自任社长，聘梁思成、刘敦桢分任法式部、文献部主任，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调查研究，影响深远。建国后历任中央文史馆馆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傅熹年注

[4] 参阅拙著《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作者注

此文与《敦煌壁画中所见中国古代建筑》内容相近，故未收入，可参阅该文（第129—159页）。——傅熹年补注



无可观。自经乾隆重修，建筑坐落于东院，寺之规模，更完全更改，原有布置，毫无痕迹。原物之尚存者惟阁及山门。

观音阁及山门最大之特征，而在形制上最重要之点，则为其与敦煌壁画中所见唐代建筑之相似也。壁画所见殿阁，或单层或重层，檐出如翼，斗拱雄大。而阁及门所呈现象，与清式建筑固迥然不同，与宋式亦大异，而与唐式则极相似。熟悉敦煌壁画中净土图（图 23）者，若骤见此阁，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

其外观之所以如是者，非故仿唐形，乃结构制度，仍属唐式之自然结果。而其结构上最重要部分，则木质之构架——建筑之骨干——是也。

其构架约略可分为三大部分：柱，斗拱及梁枋。

观音阁之柱，权衡颇肥短，较清式所呈现象为稳固。山门柱径亦如阁，然较阁柱犹短。至于阁之上中二层，柱虽更短，而径不改，故知其长与径，不相牵制，不若清式之有一定比例。此外柱头削作圆形（图 26），柱身微侧向内，皆为可注意之特征。

斗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柱式（order）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柱式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唐宋建筑之斗拱以结构为主要功用，雄大坚实，庄严不苟。明清以后，斗拱渐失其原来功用，日趋弱小纤巧，每每数十攒排列檐下，几成纯粹装饰品，其退化程度，已陷井底，不复能下矣。观音阁山门之斗拱，高约柱高一半以上，全高三分之一，较之清式斗拱——合柱高四分或五分之一，全高六分之一者，其轻重自可不言而喻。而其结构，与清式宋式皆不同；而种别之多，尤为后世所不见。盖古之用斗拱，辄视其机能而异其形制，其结构实为一种有机的，有理的结合。如观音阁斗拱，或承檐，或承平座，或承梁枋，或在柱头，或转角，或补间，内外上下，各各不同^[1]，条理井然。各攒斗

[1] 楼阁外周之露台，古称“平座”；斗拱之在屋角者为“转角铺作”，在柱与柱之间者为“补间铺作”。——作者注

拱，皆可作建筑逻辑之典型。都凡二十四种，聚于一阁，诚可谓集斗拱之大成者矣！

观音阁及山门上梁枋之用法，尚为后世所常见，皆为普通之梁，无复杂之力学作用。其与后世制度最大之区别，乃其横断面之比例。梁之载重力，在其高度，而其宽度之影响较小；今科学造梁之制，大略以高二宽一为适宜之比例。按清制高宽为十与八或十二与十之比，其横断面几成正方形。宋《营造法式》所规定，则为三与二之比，较清式合理。而观音阁及山门（辽式）则皆为二与一之比，与近代方法符合。岂吾侪之科学知识，日见退步耶！

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是也。清式建筑，皆以“斗口”^[1]为单位，凡梁柱之高宽，面阔进深之修广，皆受斗口之牵制。制至繁杂，计算至难；其“规矩”对各部分之布置分配，拘束尤甚，致使作者无由发挥其创造能力。古制则不然，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制，梁枋不下千百，而大小只六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观音阁天花，亦与清代制度大异。其井口甚小，分布甚密，为后世所不见。而与日本镰仓时代^[2]遗物颇相类似，可相较鉴也。

阁与山门之瓦，已非原物。然山门脊饰，与今日所习见之正吻不同。其在唐代，为鳍形之尾，自宋而后，则为吻，二者之蜕变程序，尚无可考。山门鸱尾，其下段已成今所习见之吻，而上段则尚为唐代之尾，虽未可必其为辽原物，亦必为明以前按原物仿造，亦可见过渡形制之一般。砖墙下部之裙肩，颇为低矮，只及清式之半，其所呈现象，至为奇特。山西北部辽物亦多如是，盖亦其特征之一也。

观音阁中之十一面观音像，亦统和重塑，尚具唐风，其两傍侍立菩萨，与盛唐造像尤相似，亦雕塑史中之重要遗例也。

[1] 斗拱大斗安拱之口为“斗口”。——作者注

[2] 日本古代历史时代，起自公元1185年，止于公元1333年，当中国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至元顺帝元统元年。镰仓时代建筑受同期中国南方建筑影响较大。——傅熹年注



二 寺史

蓟县在北平之东百八十里。汉属渔阳郡，唐开元间，始置蓟州。五代石晋，割以赂辽^[1]，其地遂不复归中国。金曾以蓟一度遣宋，不数年而复取之。宋元明以来，屡为华狄冲突之地；军事重镇，而北京之拱卫也。蓟城地处盘山之麓。盘山乃历代诗人歌咏之题，风景幽美，为蓟城天然之背景。

蓟既为古来重镇，其建置至为周全，学宫衙署，僧寺道院，莫不兼备（图1）。而千数百年来，为蓟民宗教生活之中心者，则独乐寺也。寺在城西门内，中有高阁，高出城表，自城外十余里之遥，已可望见。每届废历^[2]三月中，寺例有庙会之举，县境居民，互数十里跋涉，参加盛会，以期“带福还家”。其在蓟民心目中，实为无上圣地，如是者已数百年，蓟县耆老亦莫知其始自何年也。

独乐寺虽为蓟县名刹，而寺史则殊渺茫，其缘始无可考。与蓟人谈，咸以寺之古远相告；而耆老缙绅，则或谓屋脊小亭内碑文有“贞观十年建”字样，或谓为“尉迟敬德监修”数字，或将二说合而为一，谓为“贞观十年尉迟敬德监修”者，不一而足。“敬德监修”，已成我国匠人历代之口头神话，无论任何建筑物，彼若认为久远者，概称“敬德监修”。至于“贞观十年”，只是传说，无人目睹，亦未见诸传记。即使此二者俱属事实，亦只为寺创建之时，或其历史中之一段。至于今日尚存之观音阁及山门，则绝非唐构也。

蓟人又谓：独乐寺为安禄山誓师之地。“独乐”之名，亦禄山所命，盖禄山思独乐而不与民同乐，故尔命名云。蓟城西北，有独乐水，为境内名川之一，不知寺以水名，抑水以寺名，抑二者皆为禄山命名也。

寺之创立，至迟亦在唐初。《日下旧闻考》引《盘山志》云^[3]：

独乐寺不知创自何代，至辽时重修。有翰林院学士承旨刘成碑。统

[1] 1927年北伐后，北京改称北平，至1949年建国后，又改称北京。此文撰于1932年，故称北京为北平。——傅熹年注

[2] 即夏历。1927年以后推行公历，故称夏历为废历。——傅熹年注

[3] 同治十一年李氏刻本《盘山志》尚无此段。——作者注

和四年孟夏立石，其文曰：“故尚父秦王请谈真大师入独乐寺，修观音阁。以统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大阁一所。重塑十一面观音菩萨像。”

自统和上溯至唐初三百余年耳。唐代为我国历史上佛教最昌盛时代；寺像之修建供养极为繁多，而对于佛教之保护，必甚周密。在彼适宜之环境之下，木质建筑，寿至少可数百年。殆经五代之乱，寺渐倾颓，至统和（北宋初）适为需要重修之时。故在统和以前，寺至少已有三百年以上之历史，殆属可能。

刘成碑今已无可考，而刘成其人者，亦未见经传。尚父秦王者，耶律奴瓜也^[1]。按辽史本传，奴瓜为太祖异母弟南府宰相苏之孙，“有膂力，善调鹰隼”，盖一介武夫。统和四年始建军功。六年败宋游兵于定州，二十一年伐宋，擒王继忠于望都。当时前线乃在河北省南部一带，蓟州较北，已为辽内地，故有此建置，而奴瓜乃当时再建观音阁之主动者也。

谈真大师，亦无可考，盖当时高僧而为宗室所赏识或敬重者。观音阁之再建，是在其监督之下施工者也。

统和二年，即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也。阁之再建，实在北宋初年。《营造法式》为我国最古营造术书，亦为研究宋代建筑之惟一著述，初刊于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2]，上距阁之再建，已百十六年。而统和二年，上距唐亡（昭宣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仅七十七年，以年月论，距唐末尚近于法式刊行之年。且地处边境，在地理上与中原较隔绝。在唐代地属中国，其文化自直接受中原影响，五代以后，地属夷狄，中国原有文化，固自保守，然在中原若有新文化之产生，则所受影响，必因当时政治界限而隔阻，故愚以为在观音阁再建之时，中原建筑若已有新变动之发生，在蓟北未必受其影响，而保存唐代特征亦必较多。如观音阁者，实唐宋二代间建筑之过渡形式，而研究上重要之关键也。

[1] 查辽史，统和四年碑上提到的“故尚父秦王”应是韩匡嗣，而不是开泰初始（公元1012—1021年）加尚父的耶律奴瓜。——莫宗江注

[2] 《营造法式》初刊于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莫宗江注



阁之形式，确如碑所载，“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阁实为三级，但中层为暗层，如西式之 Mezzanine。故主要层为两级，暗层自外不见。南北八架云者，按今式称为九架，盖谓九檩而椽分八段也。

自统和以后，历代修葺，可考者只四次，皆在明末以后。元明间必有修葺，然无可考。

万历年间，户部郎中王于陞重修之，有《独乐大悲阁记》，谓：

……其载修则统和己酉也。经今久圯，二三信士谋所以为缮葺计；前饷部柯公^[1]，实倡其事，感而兴起者，殆不乏焉。柯公以迁秩行，予继其后，既经时，涂暨之业斯竟。因瞻礼大士，下赌金碧辉映，其法身庄严钜丽，围抱不易尽，相传以为就刻一大树云。

按康熙《朝邑县后志》：

王于陞，字启宸，万历丁未进士。以二甲授户部主事，升郎中，督饷蓟州。

丁未为万历二十五年（公元 1595 年）。其在蓟时期，当在是年以后，故其修葺独乐寺，当在万历后期。其所谓重修，亦限于油饰彩画，故云“金碧辉映，庄严钜丽”，于寺阁之结构无所更改也。

明清之交，蓟城被屠三次，相传全城人民，集中独乐寺及塔下寺，抵死保护，故城虽屠，而寺无恙，此亦足以表示蓟人对寺之爱护也。

王于陞修葺以后六十余年，王弘祚复修之。弘祚以崇祯十四年（公元 1641 年）“自盘阴来牧渔阳”。入清以后，官户部尚书，顺治十五年（公元 1658 年），“晋秩司农，奉使黄花山，路过是州，追随大学士宗伯菊潭胡公来寺少憩焉。风景不殊，而人民非故；台砌倾圯，而庙貌徒存……寺僧春山游来，

[1]《蓟州志》（官秩·户部分司题名），柯维蓁，万历中任是职，王于陞之前任。——作者注

讯予（弘祚）曰，‘是召棠冠社之所凭也，忍以草莱委诸？’予惟惟，为之捐资而倡首焉。一时贤士大夫欣然乐输，而州牧胡君^[1]，毅然劝助，共襄盛举。未几，其徒妙乘以成功告，且曰宝阁配殿，及天王殿山门，皆焕然聿新矣。”（《修独乐寺记》）

此入清以后第一次修葺也。其倡首者王弘祚，而“州牧胡君”助之。当其事者则春山妙乘。所修则宝阁配殿，及天王殿山门也。读上記，天王殿山门，似为二建筑物然者，然实则一，盖以山门而置天王者也。以地势而论，今山门迫临西街，前无空地，后距观音阁亦只七八丈，其间断不容更一建筑物之加入，故“天王殿山门”者，实一物也。

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于寺内东偏……建立坐落，并于寺前改立栅栏照壁，巍然改观”（蓟州沈志卷三）。是殆为寺平面布置上极大之更改。盖在此以前，寺之布置，自山门至阁后，必周以回廊，如唐代遗制。高宗于“寺内东偏”建立坐落，则“寺内东偏”原有之建筑，必被拆毁。不惟如是，于“西偏”亦有同时代建立之建筑，故寺原有之东西廊，殆于此时改变，而成今日之规模。“巍然改观”，不惟在“栅栏照壁”也。

乾隆重修于寺上最大之更动，除平面之布置外，厥惟观音阁四角檐下所加柱（图23），及若干部分之“清式化”。阁出檐甚远，七百余年，已向下倾圮，故四角柱之增加，为必要之补救法，阁之得以保存，惟此是赖。

关于此次重修，尚有神话一段。蓟县老绅告予，当乾隆重修之时，工人休息用膳，有老者至，工人享以食。问味何如，老者曰：“盐短，盐短！”盖鲁班降世，而以上檐改短为不然，故曰“檐短”云。按今全部权衡，上檐与下檐檐出，长短适宜，调谐悦目，檐短之说，不敢与鲁班赞同。至于其他“清式化”部分，如山花板，榑脊及山门雀替之添造，门窗隔扇之修改，内檐柱头枋间之填塞，皆将于各章分别论之。

高宗生逢盛世，正有清鼎定之后，国裕民安，府库充实；且性嗜美术，

[1]《蓟州志》（官秩·知州题名），胡国佐，三韩人，廪生。修学宫西虎戟门，有记。升湖广德安府同知，去任之日，民攀轸号泣，送不忍舍，盖德政有以及人也。——作者注



好游名山大川。凡其足迹所至，必重修寺观，立碑自耀。唐宋古建筑遗物之毁于其“重修”者，不知凡几，京畿一带，受创尤甚。而独乐寺竟能经“寺内东偏”坐落之建立，观音阁山门尚侥幸得免，亦中国建筑史之万幸也。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两宫回銮”之后，有谒陵^[1]盛典，道出蓟州，独乐寺因为坐落之所在，于是复加修葺粉饰。此为最后一次之重修，然多限于油漆彩画等外表之点缀。骨干构架，仍未更改。今日所见之外观，即光绪重修以后之物。

有清一代，因坐落之关系，独乐寺遂成禁地，庙会盛典，皆于寺前举行。平时寺内非平民所得入，至清末遂有窃贼潜居阁顶之轶事。贼犯案年余，无法查获，终破案于观音阁上层天花之上；相传其中布置极为完善，竟然一安乐窝。其上下之道，则在东梢间柱间攀上，摩擦油腻、尚有黑光，至今犹见。

鼎革以后，寺复归还于民众，一时香火极盛。民国六年，始拨西院为师范学校。十三年，陕军来蓟，驻于独乐寺，是为寺内驻军之始。十六年，驻本县保安队，始毁装修。十七年春，驻孙□□^[2]部军队，十八年春始去。此一年中，破坏最甚。然较之同时东陵盗陵案，则吾侪不得不庆独乐寺所受孙部之特别优待也。

北伐成功以后，蓟县党部成立，一时破除迷信之声，甚嚣尘上，于是党委中有倡议拍卖独乐寺者。全蓟人民，哗然反对，幸未实现。不然，此千年国宝，又将牺牲于“破除迷信”美名之下矣。

民国二十年，全寺拨为蓟县乡村师范学校，阁，山门，并东西院坐落归焉。东西院及后部正殿，皆改为校舍，而观音阁山门，则保存未动。南面栅栏部分，围以土墙，于是无业游民，不复得对寺加以无聊之涂抹撕拆。现任学校当局诸君，对于建筑，保护备至。观音阁山门十余年来，备受灾难，今归学校管理，可谓渐入小康时期，然社会及政府之保护，犹为亟不容缓也。

[1] 清东陵，在蓟东遵化县境。——作者注

[2] 指孙殿英。——傅熹年注